

枇杷黄时

□陈春萍

枇杷又熟了。那些黄澄澄的果子，在五月的阳光下，显出几分骄矜来。我站在楼上，俯视楼下的枇杷树，竟有些恍惚。20余年的光阴，便如此这般地从指缝间溜走了。

记得那年自云南旅游归来，临上车提回一筐云南白枇杷，果肉晶莹，甜而不腻，又略带一些隐秘的酸。尝过枇杷好吃味道的女儿，那年10余岁光景。女儿捧着几粒枇杷核，眼里跳动着奇异的光。她蹲在露台的角落，用花铲掘出几个小坑，将核一粒粒埋进土里。覆土时仿佛在完成某种神圣仪式。我笑她心急，她却仰起沾着泥点的小脸：等结了果，我们就能不用买枇杷，天天又得吃了。

谁曾想，梅雨季过后，竟真有嫩芽顶破泥土，像怯生生的绿舌头。枇杷树长得快，两三年便有把种菜的露台占领的意思。女儿那时已上了初中，早把种树的事忘在脑后。我将一棵稍大的苗移到了小区的楼道口。移栽以后几天，女儿恰好放学回来，见了移栽的枇杷便道：原来枇杷树还活着。语气平淡语气淡得像在讨论天气。

草木无情，人却多情。枇杷树在

楼道口扎了根，一年高过一年，却迟迟不见结果。第八个年头，就在我几乎放弃期待时，在深秋初冬的时光枝头，忽然冒出了几簇不起眼的小花，白中透黄，羞怯地藏绿叶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它并非不会结果，只是需要足够的光阴酝酿。待到五月，那些青涩的小果渐渐膨大，由青转黄，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剥开一颗，果肉厚实，汁水丰盈，竟与当年从云南带回的一般无二，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女儿种下它的那一刻。如今，枇杷树已蹿到三楼高，采摘有些困难。

其实小区物业也种了些本地枇杷，果子小而酸，大人和孩子摘了尝过几回便鲜少有人问津。唯独女儿种的那棵，结的果子又大又甜，年复一年成了邻居们的心头好，早早就被人惦记上了。每到四月底五月初，总有人站在树下张望，白枇杷总比其他枇杷早熟那么几天，等不及果子熟透，往往转眼间就被人摘了一个干净。起初难免心疼，后来倒觉得，能被众人期待，何尝不是草木的福分。

后来，女儿上大学、工作、结婚，生

活的步履匆匆，那株枇杷树渐渐成了她记忆里的模糊背景。偶尔问起，她也只是随口应一句：结得多吗？便再无下文。儿时那种蹲在露台上眼巴巴等待发芽的热忱，早已被岁月冲淡。人总是如此，成长路上，许多曾经的赤诚会悄然褪色，唯有那棵树，依旧固执地替她记着。如今，成年人的世界里，总有更重要的事排在枇杷之前。

枇杷又熟了，黄得格外鲜艳。早春一场倒春寒，冻落了不少花苞，结的果子也比往年小，却意外地更甜。邻居帮忙摘了几颗，我尝过后，便打电话告诉女儿。她说，前几天我们去福建罗源湾的时候摘过几颗，还有些酸。我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笑她不等枇杷最美味时光。握着手机，忽然想起她小时候蹲在露台上的背影，那么认真。

草木终究比人长久。我们种下一棵树，原不过是一时兴起，树却默默记了一生，年年开花结果，仿佛在固执地兑现一个被遗忘的承诺。

枇杷又黄，摘一颗放进嘴里，枇杷的甜在舌尖化开，原来清甜里藏着岁月的醇厚。

听王菲唱《世界赠予我的》

(组诗)
剑雨

星空

星座是萤火虫在天上飞出的阵型
北斗七星是七只调皮的萤火虫
偷酒喝逃跑时留下的指纹
有一次你顺着天窗往上看
看见星星很亮离你最近
那是萤火虫飞回来
睁大眼睛在找你

虫鸣

整个夏季我最喜欢的
莫过于去永康江听王小宁唱歌了
开始他是自弹自唱
后来加入了非洲鼓和口琴
到了深秋代名叫秋蝉的人
也在那唱
好几次和他通电话
我都听出来电话里有虫子叫
还听出来有几只虫子
是什么虫子

风铃

秋风把银杏叶吹得沙沙响
一片叶子就是一个木质的风铃
这么多风铃一同响起来
会把掩耳盗铃的人吓跑
从地上捡起一只飘落的风铃
对着它轻轻吹一口气
它又会叮叮当当响起来
你也捡走过一个风铃
在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寄给了白鹭溪
不用担心信件会遗失
只要风一吹
它就会叮叮当当响起来

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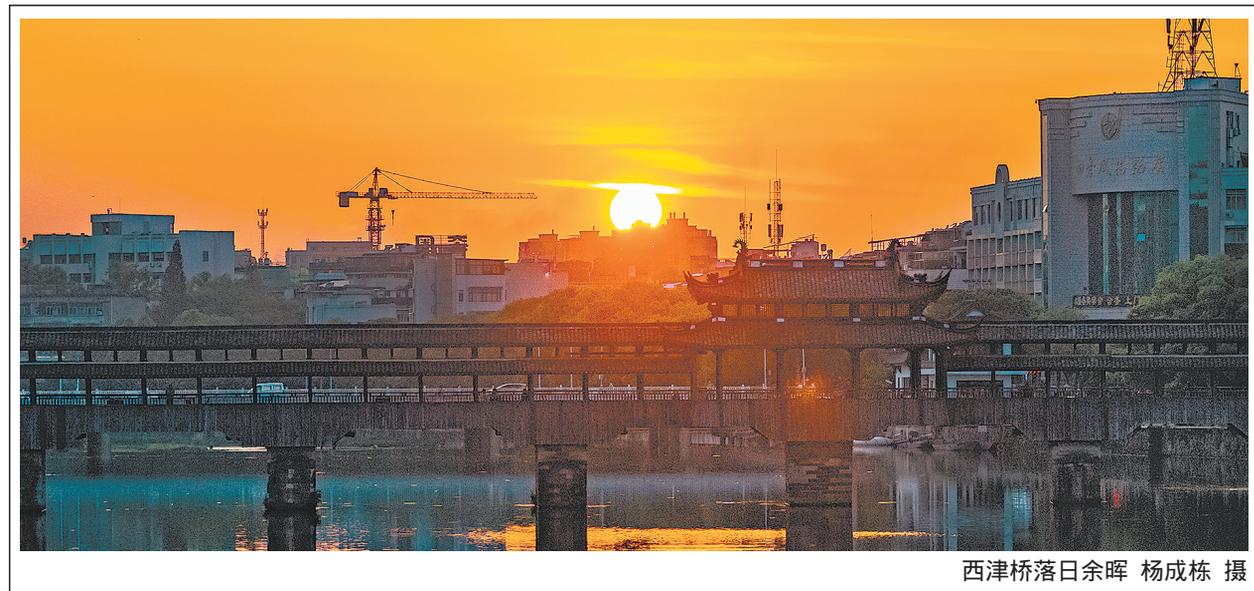
在梅林吹竹坝
相当于把梅和竹画在同一张纸上
竹干要有气势
竹叶要带有风
而梅要含蓄
大部分竹子在成为坝之前
被当作笋吃掉或被当作柴火烧掉
编成竹篮提在你手上另当别论
可以和胡红波吹的竹坝相媲美

回敬

所有的缄默都是礼让惊蛰
我把原本要对着一坛未开封的老酒
诵读的《将进酒》忍了回去
原本要借酒发挥的古琴曲《渔樵问答》
也因酒未尽兴未演奏
只有滴滴答答的春雨
才是堂而皇之的声音

屋顶

我从懿德堂偷走一朵梅花
你飞檐走壁来寻我
青灰色的瓦檐
最适合你的轻功了
头顶上还悬着月亮
天时地利人和都被你占尽了
我用分身术把暗香藏于多处
还是被你降了



西津桥落日余晖 杨成栋 摄

一道温柔的光

卢俊英

外婆出生于1918年，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已年近花甲。小时候的我不懂1918意味着什么，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身高一米五、体重不过四十公斤的小老太太。她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窝成一个髻，常年穿着或藏蓝或普蓝或天蓝的大襟短衫，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

外婆是恬淡宁静的，她语不高声，不扎堆、不八卦、不拜佛，跟刻板的农村妇女形象很不同。学校放假，我们去外婆家，老远就喊外婆。外婆总会一边应声一边忙不迭地从屋里出来。外婆家也是几乎没有空闲。偶尔外婆不在屋里，我们扭头就跑溪边去，定能看到她在洗衣服或是在山脚菜地摘菜。看到她，我们就能安心。

下雨天，我最喜欢看着外婆做手工活。外婆家有木板搭成的阁楼，挑开的屋檐下是老式推开的窗户，采光和通风都很好，屋檐挂下的雨帘就是此刻的窗帘。外婆通常坐在窗边做活，给外公短褂肩膀打补丁，针脚细密，看不到补丁布料的毛边。更多时候，外婆是在绩麻。经过此前多道工序得到的苕麻纤维洁白干硬，需得披开接续起来搓成线。这是一份细致且持久的手工活。我们从小睡的苕

麻蚊帐，就是外婆绩的麻线织的。多少时光，就这样静静地绩进绵长的麻线中。

如此恬淡安静的外婆，谁能想到她曾赤脚从磨难中走来。旧时女子，娘家兄弟是她的靠山，丈夫是她的天。然而，外婆没有兄弟，外公也并非安分守己之人。外公出身富裕农家，性情疏阔。作为长子，他少年时期便带领一众长工下地耕作，学会农活也学会了颐指气使。

抗战期间，日寇过境，外公被抓去当挑夫，外婆拖着老人孩子躲进山里，家里遭到抢劫，好在外公豁出命逃离魔掌，而跟他一起被抓的乡亲却从此杳无音信。

解放战争时期，乡里筹划组建保卫团，外公受指派带着银元去镇上购买枪支，走在半路受赌友引诱输了个精光，被投进牢房等待军法处置。从未出过远门的外婆，变卖家财，四处奔走，填补窟窿、打点关节，终于让外公免于灾难，但家境一落千丈。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决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主动捐献仅剩的家产，换来一个生产小队长职务，天天带着社员们为集体出工干活。此时，家

里真是一穷二白了，却也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定为下中农，而外公和叔公则被定为富农。即便这样，我母亲也因为有个富农爷爷而被高中学校拒收。

时代的风雨、命运的坎坷，如霜刀、如鞭子，记记抽打在外婆身上，却始终无法阻挡外婆含辛茹苦养大了五个儿女和十四个孙儿辈。外婆不信佛，相信世间有公道，更相信天道酬勤。她没空怨天尤人，总是那么忙。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生活还普遍比较苦，外婆养猪养鸡腌菜晒萝卜干抽素面。她勤俭持家，用消瘦的肩膀扛起一方屋檐，让一家老小不挨饿受冻。

生长于那个年代的外婆，识得一些字，却不一定读过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外婆的那份柔韧、那份坚忍、那份骨子里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足以让后人仰视。她是我心目中最伟岸的母亲形象。

外婆以九十高寿离世，但她宛如一道温柔的光，持续为我照亮前行的路。